



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以经济视点为中心

张季风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区域经济合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欧洲以EU为中心，在北美以NAFTA为中心的比较稳定的经济圈已经形成。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也加快了合作的步伐。《清迈倡议》的达成，标志着东亚地区金融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国与NAFTA之间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开始正式谈判，而日本与新加坡、日本与韩国也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进行谈判。这些动向表明东亚经济合作出现了新高潮。从当前东亚经济合作现状来看，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两条主线已经比较清晰：其一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其二是日本与新加坡、日本与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目前，将这两条线合为一条线，及时提出构筑“东亚共同体”的理念非常重要。[1] 身为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中国和日本有责任，也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构筑“东亚共同体”，不仅在经济合作方面，而且在政治、安全以及国防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本身，就是对这一区域内和平和世界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有助于使人们的视线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转向区域统合的健康方向。这一理念的建立将使日本国民更加关注亚洲，有利于克服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沟壑，也利于解决这一地区存在的其他复杂问题。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理念的确立，对于改善日本和亚洲邻国的关系，特别是改善中日关系将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世界区域经济统合现状与东亚经济合作

目前，世界上多国间、区域间以及行业间的国际合作团体和组织为数众多。其中最重要也比较完善的区域经济圈当数EU和NAFTA。当然，APEC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一组织过于庞大，过于松散，而且政治色彩较浓，在实质性的经济合作方面难以和EU和NAFTA相比。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但不容否认，区域经济圈的建立也存在对域外地区实行排斥的现象。比如说，EU一方面进行区域内的合作并继续向中欧和东欧扩张，但另一方面它也存在排斥美国和日本的特性。NAFTA在加强本区域内的美、加、墨合作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向智利、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地区扩张。当然它也具有排斥EU和日本的特性。区域经济圈的建立虽然存在着有悖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一面，但在建立区域经济圈的过程中，各经济体通过无数次的交涉、谈判、磨合，最终走向统合所积累的许多丰富经验，也必将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松散的国家或地区组成较大的区域经济圈以后，将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说，经济区域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

非同步的，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

迄今为止，东亚区域内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在这一区域建立各种形式经济圈的尝试和研究也从来没有间断过。比如说，“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环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等都被许多学者作过认真研究。但从现状来看，只形成了包含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CEA (Chinese economic area) 和ASEAN主要5国组成的AEA (ASEAN Economic Area)。其他经济圈由于存在着各种问题，除了某种程度的项目合作以外，作为经济圈并没有形成。

东亚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应当走得更近些。在东亚地区，起经济增长火车头作用的日本和具有潜在经济发展能力的中国以及NIEs和ASEAN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东亚共同体”，将形成人口近20亿、GDP7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其规模和经济活力决不比EU和NAFTA逊色。

但令人欣喜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本地区又出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潮。首先是中国越来越重视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ASEAN首脑会谈中，中国提出关于缔结“中国+ASEAN自由贸易协定”的提案。2001年2月，江泽民主席亲自出席在海南岛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对东亚合作给予极大的重视。10月又在我国上海成功举办了APEC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ASEAN首脑会议上，中国和ASEAN正式宣布开始就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高级事务级谈判，确定在10年以内缔结这一协定，并决定年内进行第一轮谈判。

日本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由于1997年亚洲危机的发生和最近欧美跨国公司迅速进入中国市场给日本造成的压力，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取向，即开始从过去的“只追求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单纯依靠WTO的政策转向谋求区域经济统合的方向”。[2] 2001年1月，日本分别与新加坡、韩国以及墨西哥进行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谈判。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增加对东亚地区的投资，特别是加快了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从2000年开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而在2001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更加迅猛，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90%。[3]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潮的掀起，特别是中国与ASEAN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日本与韩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开始，为今后“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1、构筑“东亚共同体”对各方都有利

应当说“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对东亚各经济体都有好处。首先看一下对中国的好处。第一，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和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广大的农村和内陆地区仍然处于待开发状态，今后经济发展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发展经济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日本、韩国等亚洲近邻国家的合作关系更是不可或缺。第二，近期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并将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加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会扩大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需要与日本、韩国以及亚洲邻国的加强经济合作。而稳定的区域经济圈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再来看一下对日本的好处。第一，从长期战略来看，日本未来的发展需要有稳定的据点。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先是从“脱亚入欧”转向“脱欧返亚”，而现在又转为“脱亚入美”。日本战略伙伴的选择总是在亚洲和欧美之间徘徊。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建立自己脚下的经济发展据点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寻求将来稳定的发展，同时更好地发挥亚洲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国家战略应当是日本的最佳选择。第二，打破目前经济萧条的困境，需要开拓亚洲市场。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经济结构问题、财政结构问题、消费低迷以及国民心理不安等等。但从近因来看，最大问题是需求不足。日本经济早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个人消费和公共需求都开始进入停滞状态。在未开发出足以引起消费革命的

人气商品的情况下，扩大个人消费的可能性极小。而越来越深刻的少子、老龄化又将进一步阻碍个人消费的扩大。另外，通过财政手段、金融手段来打开萧条局面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出口和增加外需对打开困境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早已进入成熟阶段，现在也难以出现爆发性的消费革命。而且，加之EU和NAFTA的存在，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基本能够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况且这两个经济圈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排日性，因此大规模从日本进口商品也难以实现。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拓展东亚市场是日本最现实的选择。总之，建立“东亚共同体”，近期可能成为日本打破经济萧条的突破口；远期可成为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稳定基地。

构筑“东亚共同体”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也十分有利。NIEs和ASEAN各国也希望建立稳定的东亚经济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客观上已经告诉人们进一步加强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和进行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2、构筑“东亚共同体”，有利于中日两大民族的和解

构筑“东亚共同体”，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能够促进中日两大民族的真正和解。任何一个经济圈的建立必须有若干个“核心国家”的存在。“核心国家”的团结一致是建立区域经济圈的基本保证。EU的建立如果没有德、法两国的和解难以想象。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也必须由中、日两国携手共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必将是中、日两国为核心的经济圈。“东亚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中日两国的真正和解。反过来说，“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能够促进中日两国的真正和解。过去，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独领风骚，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和日本可能同时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正在不断地上升，日本应当冷静地接受这一事实。中国的上升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WTO，从理论上来说对日本是有利的。同时，日本经济的恢复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即使是再过50年，中国也只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与日本的互补性仍然存在。中日两国构筑互相信赖关系和向前看的取向十分重要。“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有助于日本消除疑虑，中国经济的上升将不被视为日本的威胁，而只能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也有利于中日两国共同跨越历史问题的沟壑。具体来说，“东亚共同体”理念的确立可望带来下列图示的变化：

中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加强经济合作→相互依存感增加→信赖感增强→克服历史问题和中国威胁论→达到真正的和解→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立。

三、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

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各异，宗教繁多，情况比较复杂，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文化、历史以及风俗等方面的共同点。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同属一个地区，存在着诸多统合的可能性。因篇幅所限，本文只限于讨论经济方面的可能性。

1. 区域内的经济互补性

中国、ASEAN各国劳动力和资源丰富。而日本和NIEs则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各国和地区主要产品的特化系数差异见表1。特化系数（特化系数=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是表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特化系数越高，表示竞争力就越高。如表1所示，中国产品中，以服装为中心的轻工产品的竞争力最强，而化工产品最弱，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简单机械类产品居中。和具有相同产业竞争力结构的泰国、印尼等国家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而日本主要产品的特化系数与中国恰恰相反，这说明中日两国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关系。中国同ASEAN等国家存在若干的竞争关系，但总体来看，中国、ASEAN各国与日本存在着互补关系。从国际分工来看，

日本与东亚域内其他经济体之间除个别领域处于水平分工状态以外，绝大多数领域基本处于垂直分工状态。在这种互补关系下的合作，各自的优势均将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更容易趋于统合。而日本与美国和欧洲之间基本处于水平分工状态，竞争大于合作。

表1 东亚各国地区主要产品特化系数（1999年）

	化工产品	原料性产品	机械产品	纤维产品
日本	0.15	0.19	0.54	-0.13
中国	-0.40	-0.02	-0.08	0.76
韩国	-0.03	0.30	0.28	0.23
台湾	-0.28	0.31	0.11	0.22
香港	-0.11	-0.10	-0.07	0.17
新加坡	0.15	-0.28	0.06	-0.09
印度尼西亚	-0.31	0.52	-0.04	0.84
泰国	-0.36	-0.08	0.05	0.69
马来西亚	-0.29	-0.09	0.13	0.34
菲律宾	-0.80	-0.54	-0.06	0.33

资料来源：ADB, 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2000

尽管90年代是日本“失去的年代”，但日本的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债权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日本拥有从应用技术到尖端技术的各种层次的先进技术，制造业技术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而其他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源，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人工费低廉。中国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状态达到“转换点”，[4]尚需时日。中国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正是日本所求之不得的，而日本的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也正是中国所急需的，中日两国的统合可谓珠联璧合。

2. 区域内的经济依存关系

(1) 区域内贸易

从80年代到1996年中期，东亚地区内的贸易已接近本区域贸易总额的近50%，远远超过NAFTA区域内贸易率。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90年代末东亚区域内的贸易率有所下降，但仍然占45%左右。从日本对东亚地区的依存度来看，出口和进口分别为36.8%和38.4%（1999年）。与80年代相比，增长了近一倍，这虽然不及德国对EU的56.4%和54.1%（1998年），但却远远高于美国对NAFTA的35.0%和30.0%（1998年）。目前的问题是，东亚地区对日本的依存度，出口仅为11.4%，进口仅为17.0%（1998年），仍处于低水平状态（见表2）。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今后区域内贸易结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余地还很大。

表2 东亚地区的贸易相关关系

		出口				进口			
		对日本	对东亚	对美国	对EU	对日本	对东亚	对美国	对EU
日本	1980		21.8	24.5	15.1		20.9	16.8	5.9
	1998		38.3	26.3	14.6		36.0	20.7	12.7
东亚	1980	21.2	21.8	18.2	15.9	22.5	21.0	16.1	12.4
	1998	11.4	37.8	19.2	14.7	17.0	37.2	12.2	12.3

注：东亚是指ASEAN5国、中国、韩国、台湾、香港。

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2）外国直接投资（FDI）

到目前为止的东亚经济在“后发型利益”、“后发关联效应”、“多层次追赶结构”等的特殊条件下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5] 东亚地区的工业化与其说是“内发性”的，倒不如说是以不断扩大、不断吸引外资的形式而形成的“外向型”工业化。NIEs、ASEAN和中国几乎都是通过扩大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来带动生产发展，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东亚的直接投资中日本所占的比重最大。在高峰期的1993年，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余额，日本达到650亿美元，远远高于美国的380亿美元和EU的230亿美元。1997年，东亚地区九个经济体（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从日本吸引的直接投资，合计为1096亿美元，远远高于居第二位的美国的645亿美元。[6] 另外，从投资产业来看，日本向欧美的直接投资是主要是投向非制造业，而向东亚地区的投资中，以制造业为主，比例超过了60%。这种投资结构对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但日本对东亚的投资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以下三点：第一，东亚地区吸收的外资中，日本的投资份额在下降。过去东亚地区的投资主要来自于日本，例如1990年日本的投资占1/4强（26%）。但最近欧美的投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1999年对东亚的直接投资额中，来自日本的投资下降为8%。[7] 第二，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近年来不断下降（见图1）。第三，日本对东亚的证券投资（间接投资）极少，几乎等于尚未开拓，这是今后亟需解决的课题。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加剧、日本实行金融体制改革、东亚地区投资环境等，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到日本经济的战略已经从“脱欧返亚”向“脱亚入美”的转换。

图1 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变化（申报数）

资料来源：大藏省

到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的资本合作及直接投资的轨迹，先是由日本投向NIEs，接下来是日本投向ASEAN和中国。90年代以来，直接投资开始呈多元化发展。日本的投资量虽然仍居首位，但NIEs向ASEAN和中国的投资急剧增加。特别是近两、三年内，香港向中国大陆，台湾向中国大陆，韩国向中国的直接投资的生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日本。

（3）ODA

日本的ODA也是以东亚为中心，其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所占比重最大。ODA的主要部分是日元贷款。日元贷款具有利息低、偿还时间长等特点，对接受方很有利。日元贷款的援助方针是选择“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现在日元贷款已经将援助方向从过去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环境领域和内陆地区的扶贫工程。日本的ODA援助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从1979年开始接受ODA，这笔款项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ODA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日本民间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开拓。

3. 区域内经济关系良性循环的机制

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由于经济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其发展基本是顺利的。其主流处于“直接投资—贸易—ODA”三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状态。

日本扩大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在于：广场协议以后，日元不断升值使国内出现大量过剩资金。由于后发效应的终结，国内投资空间变小，剩余资本在国内“自我繁殖、联动体机能的丧

失”，迫使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处于饱和和激烈竞争状态的家电资本，还是卷入世界经济竞争浪潮的IT和半导体资本，都陷入难以增值的困境。因此这些资本时而以生产的某一工序的形式或者是生产过程的全部转入东亚地区，跨越工资和汇率的壁垒以达到自我保护或谋求跨国公司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扩大的推力要因是先进国家的过剩资本存在。而与此相对应的拉力要因是本地区的NIEs、ASEAN和中国以及越南等经济体相继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的和开放等一系列外向型工业化政策。随着吸引外资的扩大，资金接受方的各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成为颇具魅力的存在。如此一来，从发达国家引进的直接投资、ODA和对外贸易相互促进联动，在本地区形成良性循环。以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为例，则存在如图2所示的机制。中日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关联性也证明了这一机制的存在（见图3）。

图2 中日经济合作的良性循环机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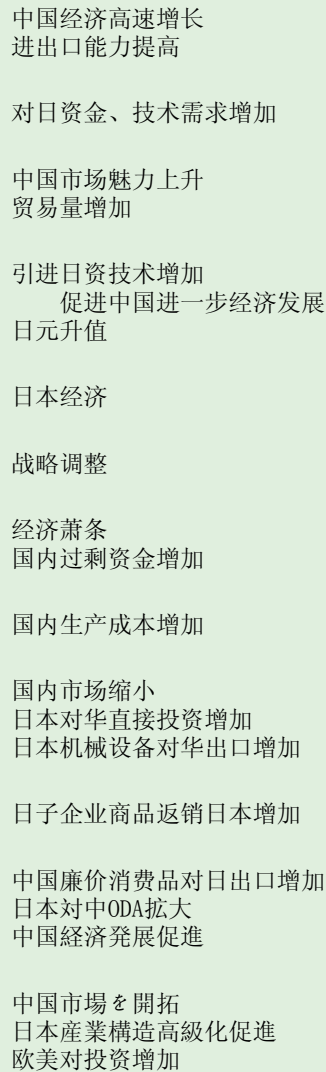


图3 中日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关联关系

作为结论，笔者认为只要如图2所示的良性循环机制不崩溃，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良性循环就不会发生变化。现在，“日本希望向海外投资的大企业中，70%以上首选中国”的调查结果也已证明了这一点。 [8]

4、其他有利因素

除了上述已经存在的域内经济互补性、经济依存性和处于良性循环的合作机制外，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有利因素。首先是东亚各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过去，由于遭受过日本的侵略，而日本又没有向德国那样对侵略战争进行认真悔过，加之战前“大东亚共荣圈”阴影的负面影响，东亚各国对日本始终抱有怀疑和警惕，特别是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和8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后，东亚各国更担心日本的经济扩张会影响到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东亚地区对日本的不信任和警惕，才使得日本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亚洲经济合作的计划受挫。 [9] 而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的作用从过去的抵抗、警惕转为期待。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衰退使人们对日本经济扩张的恐惧感降低，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经济的萧条严重制约了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区域内各经济体反而都企盼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因为日本经济状况的好转可以直接扩大大地区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共同抵御经济危机的呼声自然就会越来越强。东亚地区对日本态度的转变为“东亚共同体”的构筑带来了新的机遇。

过去曾经是竞争对手关系的中国和ASEAN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估计今后在ASEAN地区，已经很难再出现像李光耀、马哈蒂尔、苏哈托那样的强有力人物。ASEAN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相对减弱，政治和经济同时繁荣的局面很难重现。ASEAN地区由于政局不稳、经济徘徊，发展速度趋缓，单独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地区势力几乎不可能，因此与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关系只能由对抗转向联合，而事实上也正向这种方向发展。中国与ASEAN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谈判已经开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近年来东亚区域内除贸易和直接投资得到顺利发展外，金融合作进展也很迅速。1998年8月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由于美国和IMF等的反对而未能得以实现。但后来情况已经发生明显逆转。2000年5月，ASEAN+3（中日韩）财长会议达成了货币互换协定。这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 [10]

除了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外，区域内的政治对话、外交等领域的协作也在进一步加强。10+3（ASEAN+中日韩）的首脑对话越来越频繁，这有望成为将来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基础框架。

5、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具体步骤

当然，“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决非一日之功，只能是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构筑“东亚共同体”，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亚洲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距；第二，中日两国尚未实现真正和解；第三，本地区仍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鸿沟；第四，美国因素的存在。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具体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可能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确立“东亚共同体”理念，同时深化包括金融合作在内的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应该有意识地加强中日之间，日本和ASEAN之间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在经济上加强合作是第一步。通过区域内各地区的合作，特别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合作，来填补经济发展差距。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化，中日两国的和解也将会得到促进。

第二阶段，实现中国—ASEAN自由贸易区、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上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构筑“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实现CEA—日、日—韩—新FTA，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

第四阶段，实现“东亚共同体（AC）”或者“亚盟（AU）”。实现东亚地区的货币统一，甚至政治统一。

结 语

以上从经济视点论述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欧洲的EU从合作到统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历程，东亚地区情况更为复杂，不可能指望在一夜之间实现统合。现在统合的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理念”的确立。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各经济体的政府和人民应当树立起“亚洲统合”的信念，并将其作为最高战略。一旦各经济体都确立起这样的战略，就更容易走到一起。为了实现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必然会加深依存感和信赖感。那么，中日之间，日本和亚洲邻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一些复杂问题如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中国威胁论”等问题都会相应得到缓解。这些问题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化和时间的推移，甚至很可能会自然得到解决。在欧洲，由于日尔曼和法兰西两大民族的和解使EC和EU得以实现。我们相信中日两大民族的和解也必将迎来AC和AU的实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不论日本还是中国或其他东亚各国都面临着对将来发展战略的选择。虽然各自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余地，但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携手并肩，一改亚洲一团散沙的局面，建立“东亚共同体”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1] 这里的东亚地区是指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12个经济共同体。

[2] 宗像直子編著<日中關係の転機—東アジア經濟統合への挑戦>東洋經濟新聞社、2001、8pV

[3] 对外经济贸易部统计

[4]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鼻祖刘易斯的“双重结构”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劳动力将处于无限供给阶段，这会抑制城市工人工资的上升，因此发展中国家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转换点到来之前”，以低劳动成本，实现较高的增长速度。

[5] 见渡边利夫《发展经济学》

[6] 村瀬哲司「アジア安定通貨圏——ユーロに学ぶ円の役割」勁草書房、2000、4、p 220.

[7] 横田俊之“2000年通商白書と東アジア経済”《新国策》，2001年9月1日、P11

[8] 见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相关调查。

[9] 例如，日元的国际化、“环日本海经济圈”构想及“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构想等。

[10] 参见《清迈倡议》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话：64014021 传真：64014022 E-mail: ijs@cass.org.cn